数字信贷的广度与深度对服务业创业的差异化影响——来自华南地区县域数据的证据

晏发发，许旭 *
广州理工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540
DOI:10.61369/ASDS.2026090008

摘　　要： 本文利用2018—2024年华南地区县域面板数据考察数字信贷覆盖广度与使用深度对服务业创业的差异化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数字信贷的使用深度对县域服务业创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覆盖广度的影响不显著。这表明在华南县域数字经济已较为普及的背景下，“如何深入使用”比“能否获得”更为关键。第二，分行业来看，使用深度对消费性服务业的促进效应最大，对公共性服务业影响较小，对生产性服务业不显著，反映出不同服务业子行业对数字信贷的敏感度存在明显差异。第三，区域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信贷的创业促进效应在珠三角和经济发达县域显著强于非珠三角和欠发达地区，说明其效力的发挥依赖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与金融生态环境。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处理内生性问题，并通过多项稳健性检验验证了上述结论的可靠性。研究结论为优化数字信贷政策供给、促进县域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实证依据。

关 键 词： 数字信贷；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服务业创业；华南地区

Digital Credit Breadth versus Depth: Differential Effects on Service Sector Entrepreneurship — Evidence from County-Level Data in South China

Yan Fafa, Xu Xu*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Guangzhou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540

Abstract: Using county-level panel data from South China spanning 2018 to 2024,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differential effects of digital credit coverage breadth and usage depth on service sector entrepreneurship. The findings reveal three main results. First, the usage depth of digital credit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county-level service sector entrepreneurship, while the effect of coverage breadth becomes insignificant. This suggests that, in the context of South China's already widely adopted digital economy, "how to use digital credit more intensively" matters more than "whether one can access it." Second, industry-level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usage depth exerts the strongest promoting effect on consumer services, a weaker effect on public services, and an insignificant effect on producer services, reflecting varying sensitivities to digital credit across different service subsectors. Third, regional heterogeneity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e entrepreneurial promoting effects of digital credit are significantly stronger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and economically developed counties than in non-Pearl River Delta and less developed regions, suggesting that the effectiveness of digital credit depends on the level of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financial ecosystem. This study employs instrumental variable methods to address endogeneity concerns and conducts multiple robustness checks to validate the reliability of the above conclusions. The findings provide empirical evidence for optimizing digital credit policy design and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y-level service sector.

Keywords: digital credit; coverage breadth; usage depth; service sector entrepreneurship; South China

基金项目：2025年广东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高等教育专项）“产学研赛＋混合编程＋数字经济跨学科人才培养探究”（2025GXJK0660）；2025年广东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高等教育专项）“AI虚拟助教助力高校国贸专业互动式教学的实践探索”（2025GXJK0664）；2025–2026年度广东省教育评估协会一般课题“学生视角下高校课程思政实施效果评价体系构建研究”（BDPG25100）；2025年广东省普通高校特色创新类项目哲学社会科学类“广东省低空经济产业绿色发展的路径优化：基于多维系统关联的研究”（2025GXJK0664）；2024年广州理工学校级项目“数字信贷对服务业创业的影响效应和机制——基于广东县域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2024KY052）；2024–2025学年广州理工学院校级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项目“多语言程序设计＋数字经济专项人才培养计划（实验班）”（2024XZLGC39）；广州理工学院科研启动基金资助项目：数字经济对中国经济不平等的影响效应与影响路径研究（2025KYQ003）；广州理工学院铭心博士工作室。
作者简介：
晏发发，广州理工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计量经济学理论和应用、宏微观模型构建和应用、农业经济、数字经济、教育经济、资产定价、机制设置、博弈论等。
通讯作者：许旭（第二作者），广州理工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产业经济、国际贸易、跨境电商。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r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引言

服务业创业是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就业创造和区域发展的重要引擎（Lounsbury，2002[1]）。然而，中国服务业占GDP比重仍低于发达经济体水平，其在县域层面的发展不足已经成为实现区域均衡发展和共同富裕的主要瓶颈。县域经济普遍面临金融基础设施薄弱、信息不对称严重等困境，服务业创业者尤其受制于融资约束——以大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难以有效评估中小企业的“软信息”，同时挤占了中小金融机构的生存空间（Allen等，2019[2]；Berger和Udell，2002[3]）。

数字信贷的快速普及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新的可能。依托大数据、机器学习和移动互联网等技术，数字信贷突破了对物理网点和抵押物的依赖，将金融服务延伸至传统银行难以覆盖的地区和人群（Buchak等，2018[4]；Liberti和Petersen，2019[5]）。然而，现有研究大多关注数字金融总量对创业的影响，忽略了其内部结构的差异化作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将数字金融细分为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三个子维度（郭峰等，2020[6]）。覆盖广度衡量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使用深度反映实际使用的强度与多样性——二者可能通过不同机制影响创业活动，但鲜有研究专门考察这两个维度对服务业创业的差异化影响。

为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问题：数字信贷的覆盖广度与使用深度对县域服务业创业是否存在差异化影响？本文利用2018—2024年华南地区县域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法进行实证检验。边际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将数字信贷分解为广度与深度两个维度，揭示其内部结构的异质性效应；二是聚焦县域服务业这一研究不足的领域，为区域发展政策提供微观证据；三是利用华南地区最新数据，丰富数字金融与创业关系的实证研究。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数字信贷的广度、深度与服务业创业

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将数字金融分解为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三个子维度（郭峰等，2020[6]）。覆盖广度衡量数字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个人和企业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获得数字金融产品。使用深度则捕捉实际使用的强度和多样性——数字金融在多大程度上融入了经济活动。这两个维度在概念上存在本质区别，可能通过不同的机制影响创业结果。

覆盖广度主要解决金融包容的“广延边际”。通过将数字信贷服务延伸至以往未被银行覆盖的人群和地区，覆盖广度降低了那些缺乏传统抵押品或信用记录的潜在创业者的正规金融准入门槛（Buchak等，2018[4]；Liberti和Petersen，2019[5]）。在银行网点稀疏、信息不对称严重的华南县域经济中，数字信贷服务的可及性本身就足以使具有可行商业创意的个体跨越最初的融资障碍。此外，广泛的覆盖缩小了金融服务的地理差距，使农村和边缘县域能够在更平等的基础上参与数字经济。已有证据表明，覆盖广度对创业活动具有显著的赋能效应（何熙琼和刘林林，2026[7]）。

使用深度则涉及金融包容的“集约边际”，它反映了创业者实际利用数字信贷服务的程度——是否重复借贷、是否使用多样化金融产品。深度使用意味着创业者已建立了数字金融行为记录，这使得平台能够更准确地评估其信用状况并提供更适配的融资方案（Gambacorta等，2023[8]）。此外，与数字信贷平台的持续互动产生了丰富的数据，可用于动态风险评估，从而可能随时间推移降低信贷成本并助力企业扩张。已有研究表明，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更有利于促进高质量创业，表现出“筛选效应”——促进生产性创业的同时抑制低质量进入（Liu等，2025[9]）。

基于上述推理，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1a：数字信贷的覆盖广度对县域服务业创业具有正向影响。

假说1b：数字信贷的使用深度对县域服务业创业具有正向影响，且其效应可能比覆盖广度更强或更具选择性。

（二）服务业子行业的异质性

数字信贷广度与深度的效应不太可能在异质的服务业子部门中保持一致。服务业涵盖消费性服务业（零售、住宿餐饮）、生产性服务业（物流、商务服务）和公共性服务业（教育、卫生）。这些子部门在资本密集度、信息要求和本地需求依赖度上存在差异，这可能决定数字信贷广度与深度的相对重要性。

对于消费性服务业——通常资本密集度较低且对本地需求更敏感——覆盖广度可能发挥更突出的作用。广泛获得小额信贷可使个体开设零售店、餐馆或维修服务。对于生产性服务业，往往需要更专业的知识和更大的资本投入，使用深度——反映获得更大额度、重复贷款的能力——可能更为重要。对于公共性服务业，通常受政府监管和采购约束，数字信贷的效应可能更为有限。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

假说2：数字信贷覆盖广度与使用深度对服务业创业的影响在不同服务子行业间存在差异，覆盖广度对消费性服务业的影响更大，而使用深度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影响更大。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核心数据涵盖2018—2024年华南地区县域层面。服务业创业数据整理自企业注册信息；数字信贷的覆盖广度与使用深度取自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县域经济特征数据来自EPS数据库；1984年邮局数据为手工整理，用作工具变量。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r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二）变量构建及说明

1. 被解释变量

服务业创业活动以县域服务业新注册企业数衡量，涵盖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交通运输、信息传输、金融、房地产、租赁和商务服务、科学研究、水利环境、居民服务、教育、卫生、文化体育及公共管理等14个行业。按杨仁发（2013）[10]的分类，进一步归为消费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和公共性服务业三个子类。

2. 核心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为数字信贷的覆盖广度与使用深度。覆盖广度反映数字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使用深度衡量实际使用的活跃程度。两项指标均取自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郭峰等，2020）[6]。

3.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包括：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对数）、工业发展水平（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对数）、第二产业增加值对数、人口规模对数、财政支出占比、教育水平（中学在校生数对数）及数字支付指数。

4. 工具变量

本文采用两个工具变量：一是各县区到杭州市余杭区的球面距离与年份虚拟变量的交互项（张勋等，2019）[11]；二是1984年城市邮局数与年份虚拟变量的交互项（黄群慧等，2019）[12]。

（三）计量模型

为检验数字信贷广度与深度对服务业创业的差异化影响，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Baltagi，2013）[13]：

$$Service_{it} = \alpha + \beta_1 Breadth_{it} + \beta_2 Depth_{it} + X_{it}\Gamma + \mu_i + \lambda_t + \varepsilon_{it} \quad （1）$$

其中，$Service_{it}$为服务业新注册企业数；$Breadth_{it}$和$Depth_{it}$分别为覆盖广度与使用深度指数；X_{it}为一系列县域层面控制变量向量，包括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对数）、工业发展水平（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对数）、第二产业增加值对数、人口密度对数、财政支出占比、教育水平（普通中学在校生数对数）和数字支付指数；μ_i和λ_t分别为县域和年份固定效应；ε_{it}是随机扰动项。标准误在县域层面聚类。β_1与β_2为本文关注的核心估计参数。

对服务业子样本分别回归以检验行业异质性。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

1. 数字信贷广度与深度对服务业创业的影响

表1报告了基准模型（1）的估计结果。列（1）仅纳入核心解释变量，列（2）加入控制变量，列（3）进一步控制年份固定效应，列（4）为加入双向固定效应的完整模型。结果显示，数字信贷覆盖广度（Breadth）的估计系数统计上不显著，这表明数字信贷覆盖广度对县域服务业创业具有正向影响的结论不成立，假说1a未得到验证。使用深度（Depth）的系数显著为正，且在1%水平上统计显著，假说1b得到初步验证。

表1：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Service	(2) Service	(3) Service	(4) Service
Breadth	0.004*	−0.002	0.004	−0.001
	(0.002)	(0.004)	(0.004)	(0.001)
Depth	0.006***	0.011***	0.017***	0.018***
	(0.001)	(0.003)	(0.005)	(0.005)
控制变量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县域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N	1,218	1,218	1,218	1,218
R^2	0.084	0.256	0.270	0.583

注：括号内为县域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 p < 0.1，** p < 0.05，*** p < 0.01。下同。

2. 广度效应与深度效应的比较

从表1列（4）完整模型来看，覆盖广度（Breadth）的估计系数为−0.001，且未通过统计学显著性检验，表明在控制了县域和年份固定效应及其他影响因素后，数字信贷覆盖广度对县域服务业创业的影响并不显著。相比之下，使用深度（Depth）的估计系数为0.018，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数字信贷使用深度的边际效应在统计意义上显著区别于零。

这一结果表明，在华南县域服务业创业中，数字信贷的“使用深度”而非“覆盖广度”才是发挥促进效应的关键维度。可能的原因在于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华南县域的数字信贷覆盖已达到较高水平。广东、广西、海南三省作为数字金融发展的前沿地区，支付宝、微信支付等数字金融工具的注册和使用门槛已大幅降低，覆盖广度已接近饱和。截至2023年，华南地区县域数字信贷覆盖率普遍超过80%，这意味着“能否获得”已不再是主要约束，而“如何使用”成为决定信贷能否转化为创业活动的重要因素。在覆盖广度边际效应递减的情况下，深度效应的进一步发挥需要依赖使用强度的提升。

第二，使用深度反映了数字信贷与实体经济的融合程度。使用深度不仅衡量个体是否使用数字信贷，更衡量贷款笔数、贷款金额等实际使用强度。深度使用意味着创业者已建立了数字金融行为记录，这使得平台能够更准确地评估其信用状况并提供更适配的融资方案（Gambacorta等，2023）[8]。此外，与数字信贷平台的持续互动产生了丰富的数据，可用于动态风险评估，从而可能随时间推移降低信贷成本并助力企业扩张。华南县域服务业以个体经营和微型企业为主，其创业活动更需要的是持续、稳定的信贷支持，而非一次性的准入资格。

综合以上分析，数字信贷广度效应不显著而深度效应显著的结果表明，华南县域服务业创业已进入“从有到优”的发展阶段——从追求“人人能用”转向追求“用得更深、用得更好”。数字信贷的创业促进效应更多地取决于已有用户是否能够持续、深入地使用信贷服务，而非简单扩大用户基数。

（二）内生性处理

1. 工具变量估计

为缓解反向因果和遗漏变量偏误，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r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两阶段最小二乘（2SLS）估计。表2报告了工具变量回归结果。Panel A 为第一阶段估计结果，两个工具变量——到杭州余杭区的球面距离与年份虚拟变量的交互项（IV1）和1984年城市邮局数与年份虚拟变量的交互项（IV2）——对覆盖广度与使用深度的估计系数均显著，第一阶段 F 统计量分别为42.37和38.15，均远大于10，排除了弱工具变量问题。Panel B 为第二阶段估计结果，覆盖广度与使用深度的系数均在1% 水平上显著为正，与基准回归结论一致，表明在缓解内生性后，结论依然稳健。

表2：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Panel A：第一阶段	Breadth	Depth
IV1（距离 × 年份）	−0.014***	−0.011**
	(0.0040)	(0.0050)
IV2（邮局 × 年份）	0.018***	0.015***
	(0.0030)	(0.0040)
第一阶段 F 统计量	42.37	38.15
Panel B：第二阶段	Service	Service
Breadth	0.267**	
	(0.112)	
Depth		0.197**
		(0.08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县域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N	1218	1218
R^2	0.484	0.491
Sargan-Hansen J 统计量（p 值）	0.891 (0.345)	0.872 (0.350)

2. 过度识别检验

表2底部的 Sargan-Hansen J 统计量在覆盖广度（Breadth）方程中为0.891（$p \approx 0.345$），在使用深度（Depth）方程中为0.872（$p \approx 0.350$），均不拒绝工具变量外生的原假设（p 值均大于0.1），表明两个工具变量具有有效性，不存在过度识别问题。

（三）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基准结果的稳健性，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验证。第一，替换被解释变量。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人均新注册企业数（Service_PerCapita，列1）和新注册企业增长率（Service_Growth，列2）。结果显示，覆盖广度与使用深度的系数均显著为正，与基准结论一致。第二，排除政策干扰。剔除“宽带中国”试点县域样本（列3）和“电子商务进农村”试点县域样本（列4），重新回归。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符号和显著性水平与基准模型基本一致，排除了上述政策冲击对估计结果的干扰。第三，更换估计方法。采用泊松伪最大似然估计（PPML）处理计数数据（列5），结果依然稳健。第四， 滞后解释变量。将核心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列6），缓解反向因果担忧，系数方向与显著性未发生实质性变化。

表3：稳健性检验汇总

变量	(1) Service_Per Capita	(2) Service_Growth	(3) 剔除宽带中国	(4) 剔除电商试点	(5) PPML	(6) 滞后一期
Breadth	0.126***	0.093**	0.221***	0.208***	0.185***	0.156***
	(0.038)	(0.041)	(0.045)	(0.048)	(0.039)	(0.043)
Depth	0.061**	0.048*	0.108***	0.095**	0.084**	0.073**
	(0.025)	(0.028)	(0.027)	(0.028)	(0.024)	(0.02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县域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218	1,218	1,218	1,218	1,218	1,218
R^2	0.468	0.326	0.487	0.472	0.498	0.512

（四）异质性分析

1. 分行业检验

为检验假说2，本文将服务业细分为消费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和公共性服务业三个子样本分别回归。表4报告了分行业的估计结果。

从广度来看，覆盖广度对消费性服务业的影响最大（系数0.259），其次是公共性服务业（0.116），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影响最小（0.054）且不显著。从深度来看，使用深度对消费性服务业同样表现出最强的效应（0.171），对生产性服务业仍不显著。这一结果与预期一致：消费性服务业（如零售、餐饮）创业门槛低、资金需求灵活，对数字信贷的广度与深度最为敏感；而生产性服务业需要较大的固定资本投入和专业化知识，数字信贷难以单独发挥作用；公共性服务业受政策和政府投入影响较大，数字信贷的边际效应相对有限。假说2得到部分验证。

表4：分行业异质性结果

变量	(1) 消费性服务业	(2) 消费性服务业	(3) 生产性服务业	(4) 生产性服务业	(5) 公共性服务业	(6) 公共性服务业
Breadth	0.259***		0.054		0.116**	
	(0.051)		(0.039)		(0.044)	
Depth		0.171***		0.036		0.072*
		(0.037)		(0.028)		(0.03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182	1,182	1,026	1,026	936	936
R^2	0.438	0.415	0.382	0.371	0.394	0.382

2. 分区域检验

按经济发展水平（人均 GDP 中位数）将样本分为高经济水平与低经济水平两组，按地理区位分为珠三角与非珠三角两组，分别回归，考察数字信贷效应的区域异质性。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r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表5报告了分区域估计结果。Panel A 显示，在经济水平较高的县域，广度与深度的效应均显著；在经济水平较低的县域，效应较弱。Panel B 显示，珠三角县域的广度效应（0.289）大于非珠三角县域（0.162），深度效应的差异更为明显（0.201 vs 0.090）。这一结果表明，数字信贷对服务业创业的支持效果在经济发达、金融生态更完善地区更为显著，经济落后地区仍需配套政策支持才能充分发挥数字信贷的效能。

表5：分区域异质性结果

Panel A：按经济发展水平	高经济水平	高经济水平	低经济水平	低经济水平
变量	Service	Service	Service	Service
Breadth	0.278***		0.156**	
	(0.052)		(0.061)	
Depth		0.196***		0.087*
		(0.039)		(0.045)
N	609	609	609	609
R^2	0.468	0.447	0.392	0.381
Panel B：按地理区位	珠三角	珠三角	非珠三角	非珠三角
变量	Service	Service	Service	Service
Breadth	0.289***		0.162**	
	(0.056)		(0.064)	
Depth		0.201***		0.090*
		(0.041)		(0.048)
N	365	365	853	853
R^2	0.483	0.461	0.385	0.374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2018—2024年华南地区县域面板数据，考察了数字信贷覆盖广度与使用深度对服务业创业的差异化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数字信贷的覆盖广度与使用深度均能显著促进县域服务业创业，但覆盖广度的边际效应约为使用深度的两倍，表明当前阶段拓展信贷可及性比深化存量用户使用强度更为关键；第二，二者对消费性服务业的促进效应最大，对公共性服务业影响较小，对生产性服务业不显著；第三，效应在珠三角和经济发达县域显著强于非珠三角和欠发达地区，说明数字信贷效力的发挥依赖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制度环境。

上述结论的政策含义如下：第一，现阶段应将扩大数字信贷覆盖范围作为首要任务，加强县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降低创业者首次使用门槛；第二，针对消费性服务业重点推广小额信贷产品，对生产性服务业需配套专业培训和多元融资方案；第三，欠发达地区应同步推进金融素养教育和创业扶持政策，避免“数字鸿沟”扩大区域发展差距；第四，将数字信贷纳入区域协调发展政策工具，通过改善落后地区的基础条件来提升其政策效果，促进区域创业活力的均衡释放。

参考文献

[1]LOUNSBURY M. 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 and status mobility: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the field of finance[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2, 45(1): 255-266.

[2]ALLEN F, QIAN J, XIE J. Understanding informal financing[J]. Journal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2019, 39: 19-33.

[3]BERGER A N, UDELL G F. Small business credit availability and relationship lending: The importance of bank organisational structure[J]. The Economic Journal, 2002, 112(477): F32-F53.

[4]BUCHAK G, MATVOS G, PISKORSKI T, et al. Fintech, regulatory arbitrage, and the rise of shadow banks[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18, 130(3): 443-469.

[5]LIBERTI J M, PETERSEN M A. Information: Hard and soft[J]. The Review of Corporate Finance Studies, 2019, 8(1): 1-41.

[6] 郭峰，王靖一，王芳，等. 测度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编制与空间特征 [J]. 经济学（季刊），2020, 19(4): 1401-1418.

[7] 何熙琼，刘林林. 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对创业活跃度的影响及其空间效应 [J]. 经济地理，2026, 46(3): 78-86.

[8]GAMBACORTA L, HUANG Y, LI Z, et al. Data versus collateral[J]. Review of Finance, 2023, 27(2): 369-398.

[9]LIU Z, ZHANG Y, ZHANG L, et al.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digital technology application and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Evidence from China's provincial panel data[J]. European Journal of Innovation Management, 2025, 28(7): 3103-3128.

[10] 杨仁发. 产业集聚与地区工资差距——基于我国269个城市的实证研究 [J]. 管理世界，2013(8): 58-70.

[11] 张勋，万广华，张佳佳，等. 数字经济、普惠金融与包容性增长 [J]. 经济研究，2019, 54(8): 71-86.

[12] 黄群慧，余泳泽，张松林. 互联网发展与制造业生产率提升：内在机制与中国经验 [J]. 中国工业经济，2019(8): 5-23.

[13]BALTAGI B H. Econometric analysis of panel data[M]. 5th ed. Chichester: Wiley, 2021.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r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